

在研究中国传统学术的新途径上摸索前进

——周勋初教授访谈录

徐雁平

周勋初先生,上海南汇人,1929年生,195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分配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1956年底考回南京大学读副博士研究生,未及毕业即留校任教,自此后一直任教于南京大学。现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国唐代学会顾问,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顾问,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周先生治学涉及诸子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中国古典文献学、近现代学术史等学科领域,2000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周勋初文集》七册,收录《九歌新考》、《韩非子札记》、《韩非》、《张鹭文士传辑本》、《文心雕龙解析》、《中国文学批评小史》、《文史探微》、《文史知新》、《高适年谱》、《诗仙李白之谜》、《唐诗文献综述》、《唐人笔记小说考索》、《唐代笔记小说叙录》、《当代学术研究思辨》、《西学东渐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无为集》等十六种专书。此后又出版著作《李白研究》(选编)、《师门问学录》(余历雄记录)、《李白评传》、《余波集》、《韩非子校注》(参与编写、修订)。在《周勋初文集》外,周先生的著作尚有《唐语林校证》、《唐诗大辞典》(主编)、《唐人轶事汇编》(主编)、《唐钞文选集注汇存》(纂辑)、《册府元龟校订本》(主编)等。本刊特委托南京大学副教授徐雁平博士就有关学术问题采访周勋初先生。为使这次访谈与以往其他刊物的访谈有区别,在与周先生商谈后,确定访谈内容大致以《文心雕龙》研究、李白研究和《师门问学录》三个主题为中心,时间集中在2000年以后。现整理出此篇访谈录,以飨读者。

一、泛览与专精

徐雁平 周先生,您的学术研究涉及的领域比较多,而且对所研究的问题都有出色的论著,但因为学术分科、分专业的隔阂,学术界对您的研究往往只是了解其中某一方面。大家对您的学术研究有较为全面的认识,是不是要到2000年出版七卷本《周勋初文集》以后?

周勋初 我的专题研究性质的著作大都收在

文集中,这套书对于总结自己的学术研究具有特别的意义,而学术界凭借这套文集,也对我有较为全面的了解。以前我出去开会、参加学术活动,常有人对我的学术研究表示诧异,我也时有隔行如隔山的感觉,觉得自己在学术研究队伍中常是一个“另类”。

徐雁平 这套文集中有几种书写于上世纪60、70年代,那时哪有几人做学问,所以外界觉得您的学术道路比较顺,因为您一直在做研究。请问是这样吗?

周勋初 其实哪有什么顺啊。我曾用马克思对商品的分析作自我解剖,认为我这个人没有什么价值,但有使用价值。我也就是靠那么一点“使用价值”才能在高等学校中领一份口粮。邓小平在政治生涯中有三起三落,其实我这种小人物身上也有三起三落。解放初,因为我家被划为地主,而我又很看重传统的伦理道德,因此在学校,我是思想落后分子,这是一落;1956年出台新的知识分子政策,胡小石先生让我回校读研究生,这是一起;“反右”时,我在“鸣放”时发表一些言论,面临很多风险,又是一落;1959年之后,刘少奇、陈云等主政,郭影秋校长提出“坐下来,钻进去”的号召,我被委以编写和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的重任,后留校任教,又是一起;从“四清”到“文革”,我又屡遭磨难,直到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用上海话来说,这是“三跌三攒”。在我起步时,幸亏有几位老师爱护,不然哪有做学问的机会。

徐雁平 我注意到您的不少研究领域,都与您当时教的课有关,如中国文学批评史等;或与被指派的工作有关,如《韩非子》研究等。您的学术研究涉及多个领域,或者说文史打通,是否有被逼出来的原因?

周勋初 应该有这方面的原因。我这个人一辈子都没有什么固定的专业岗位,总是在不断突击,所以好多特点都和我的个人经历有关。许多教师一辈子就讲一门课,而我一开始就开了两门课。文学批评史从孔子讲到王国维,全是我一个人教。那时强调古代文学理论,所以还要教一门《文心雕龙》。加了这门课后,我连备课时间都没有了,压力特别大。此外,哪位老师缺档了,哪位老师教不下去了,都叫我去顶。一会儿教“中国古代散文”,一会儿教“大学语文”,一会儿又教文学史,就是这种状态。“文革”的时候,我既要编《辞海》,又要编《马列文论》,又要编《韩非子》,同样是耗尽精力。

我有“使用价值”,还有那么一点适应能力,我后来写文章谈治学经验,取名《顺其自然地登攀》,就是这个意思。我做事时,总是尽心竭力。如搞法家著作的注释,虽在当时只是裹挟进了政治运动,但我还是认真对待。为了注好《韩非子》,我读先秦诸子,读《左传》、《战国策》,读相关的好多书。这样干,

各种知识就贯通起来,逐渐养成了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这种贯通,就像蜘蛛结网,网越大,越能捕到更多更大的东西。编写《马恩列斯文艺论著选读》,就得读马恩原著,这对我扩大视野、提高思辨能力也有帮助。

当然,治学涉及面广,应该与我的几位老师有关。学中文,研究的是一门综合型的学问,老师胡小石先生可谓是博学多能,后人很难比。胡先生当年任南京博物院顾问,博物院买到什么钟鼎、书画等物,都来请他鉴定。又如汪辟疆先生,鉴定古籍版本的功力深厚,学校或是中文系进了一批古籍,汪先生一眼便可以定这是明版,那是清末版。他们的学问都覆盖好几个领域,这对我很有吸引力。

中央大学的一批教授,体现了清末到民国初年的学术特点。他们都有清代朴学的基础。胡先生在教我们的时候,要求学文字学、音韵学,《十三经》中也要找几本来让我们读一读。汪辟疆先生教目录学,这也是清代朴学的一个传统。程千帆先生这一辈人比较明显地继承了这些传统。程先生受朴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他从目录学入手,文献学基础一直是南京大学的传统。这些老辈也接受西方的影响,胡先生对西方的东西也很注意,如民俗学、宗教学等,这对我也有影响,在我写的《九歌新考》中不难看出。

徐雁平 很冒昧地问,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中文系的传统,不少老辈学者能写诗、填词,长于书法,您对这些有没有兴趣?

周勋初 许多朋友看见我,喜欢说:“你是胡先生的高足,帮我们写两个字吧!”说实话,我家连一支像样的毛笔都没有,诗呢,也作不好,所以我的学识和胡先生就没法比了。的确,我的老师有很多突出的本领,而我好多都拿不起手,很惭愧!我不止一次地想:当年求学条件如此好,有像胡小石先生这样的名师在,自己今天却连诗都做不好,懊悔么?细想想,觉得也没有什么可以懊悔的。为什么?如果我年轻时大部分精力用在跟胡先生学诗学字,用在跟汪先生学版本,那现在就成了这么一个人:或许有人称你书法家,却只是一般路子;或许有人称你能诗,却不见得水平有多高……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一天二十四小时睡掉的时间就有八九个小时。这个

比例是根据我自己的情况而言。我自幼就身体不好,不能开夜车。一天中再除去必要的活动,能用的时间少之又少。若扑在写字、作诗上,其他方面就很难说了。不管怎样,虽然字画不在行,但我毕竟写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是我心血之所在,多少还是被学界认可的,所以我说,不必懊悔了。

徐雁平 去年十一月份,您在一次小型会议上向博士生介绍治学经验,说读书治学,要用六分精力与时间去泛读,用四分去精读。二者若能协调好,则能培养起笼罩全局的气概,并能不断开拓新的领域。我当时有些惊讶,因为现在似乎更看重精读。散会后,与张伯伟老师说到这一用功方法,他说,这是聪明人的读书法,不容易做到。您为何如此强调泛读?

周勋初 我说这话,是有针对性的,也是个人经验的总结。现在教育领域内专业的学习更趋细密,以中文系而言,学习文学史时,就要分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两大块,如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等等;有的以文体分,如赋、诗、词、曲等等。为了更趋专精,有的老师毕生只读一本书,如《文心雕龙》;有的只研究一个人,如李白,或杜甫。这样做,也就是所谓单科独进。然而快则快矣,效果却未必好。一些教师对研究对象的情况确能迅速掌握,却未必能深入。因为就其所钻研的一本书或一个人而言,实际上牵涉面很广,就以《文心雕龙》而言,阅读这书,不能不对先秦至梁代的典籍与众多人物,乃至时代思潮、社会动向都得有所了解。我们阅读一部书,不是只认识这部书中的一个字,要对这些字中的含义都得有足够的了解。

用苏式教育培养出来的学者,也包括某些采纳欧美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专家学者,最常见的是一些博士论文型的学者。这就是说,他们在做博士论文时下过一番功夫,等到取得学位,参加工作后,一方面已很少有精力再去进行开拓,一方面此前积累的资源全部花在论文中,已无多余的资源可用,也无能力再行积累,于是就吃老本,躺在博士论文上吃用一辈子。处在这种情况下,势必难以涌现出什么杰出的大学者。我们把当下的学者与前相比,发现目前活跃于学坛的大都是一个一个小专家,已经少见堂庑博大的学者。

过分偏重专业的训练,忽视与之相关的学术,而从观察源流演变的角度看,对中国文化的传统缺乏基本的了解,显然也会产生不少局限。事实也已证明,过分强调专业,过分依赖科技,忽视思维的融会贯通,同样无法取得满意的成绩。因此,传统和现代的沟通与结合,仍有很多工作要做,仍有很多问题要探讨。

徐雁平 与泛读、专精相关的一个问题是读常见书与读未见书,您怎么看这一问题?

周勋初 这要看针对的是什么问题以及哪一个时代的问题。大体上说,读宋代、唐代以前的书要以常见书为主,以稀见书为辅。陈寅恪就是读主要的常见书,如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等,他其实也看了不少其他书,不要以为他文中没有引用,就说他没看过那些书。材料不是都要摆出来,有些要放在文章后面。

明清书多,但也要抓主体与重要的。刘重喜写博士学位论文,题为《明末清初杜诗学研究》。几年前,他让我给他的写作提纲提建议,我当时说掌握文献,强调竭泽而渔,当然不错,但杜诗文献实在太多,千家注杜,良莠杂陈,所以也不必拘泥。先泛读一遍,将一些浮泛之作弃在一旁,而把精力集中放在几种有代表性的著作上,这样也就够了。

我们一般看书总希望求全,但首先要抓住主要的。如研究王国维,首先就得精读《观堂集林》,我以为他的好文章都在这里。陈寅恪的文章,我赞成研究生细读,主要是那些稍早出版的著作,三联书店出版的《陈寅恪集》中有三大册“读书札记”,我以为不必花太多时间,这些札记比较零碎,且某些观点成熟后,大都吸收到后来正式发表的论文当中去了。

徐雁平 您涉及的研究领域多,而且在这些领域里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论文有创新性也有个性。您在写这些论文时,是否在对相关主题已经有很全面深入的了解之后才动笔?如果是这样,那您如何分配精力与时间?

周勋初 其实我在写文章前,已对所面向的问题是有一段时间的思考。但思考与写文章有不同之处,文章要有系统,有章法。实际上,写文章也是学习研究的过程。以《唐诗大辞典》的附录《唐诗文献

综述》为例,这篇文章五万多字,因为前期积累较好,两、三个月就写好了;而《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与《册府元龟(校订本)》的前言,对我来说,因为要深入到新的领域中去,就写得很辛苦。我主编的《宋人轶事汇编》即将出版,前言刚写好,三万字左右,也是用心力写的。这类文章中的有些内容,是在写的同时进行学习与探索,而不是全部学好了再写。用这种方式撰写论文,其实对自己是一种督促,催着我去思考一些问题。

二、探求中国古代文史的特色 与相应的研究方法

徐雁平 我最近读了您写的《刘勰是站在汉代经学“古文学派”立场上的信徒么?》,这篇文章的后半部分特别有意思,就是特别重视一个人的学术背景与师承,这让我想到《四库全书总目》中有好多提要似乎就是这种思路。两者之间有联系吗?

周勋初 论一人的学术,去考察他的时代背景,以及他的师承,在古代是很常见的批评方法,目录学中的“考镜源流”也寓有这层意思。这一思路被广泛应用,可见是被认可的,即承认师承或者家学的重要影响。这一方法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用得少,可能与教育制度转变有关,一个人所受的影响可能来自多方面,但也不是说可以忽略它的重要性。

我这篇文章,是在重新思考一个旧问题。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提出刘勰完全站在汉代经学“古文学派”立场上。我指出,范氏为早期注释《文心雕龙》的权威学者,故此说一出,随即得到各种不同类型的学者的赞同。杨明照先生国学基础甚深,治学恪守传统规范,也赞同这观点。王元化先生熟谙马恩原著,精于西方思辨哲学,因此他的研究《文心雕龙》,属于新派,但他也认为刘勰基本上应属儒家古文学派。

范氏为《文心雕龙》作注,起于1913—1917年就读北京大学文科国学门时。1914年,黄侃进入北京大学任教,讲授《文心雕龙》。他是章太炎的高座弟子,而章氏则为近代力主古文经学的代表人物。黄侃治经,与他的两位老师章太炎、刘师培一致,主古文经学。

自清代中期起,经学上又兴起了一阵今古文之争。清末康有为等人倡言今文经学,为其变法主张寻找理论根据,学界则视章太炎为清代朴学的最后一人。他早年投身种族革命,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学术上,与康氏全然对立。因为古文经学重视通训诂,举大义,治学以小学为基础,强调无征不信,因而时人普遍认为古文经学的研究方法比较科学。黄侃也是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

范文澜先生也治经学,当年就从世传《左氏》学的刘师培治经。范氏后来有《经学概论》一书,该书第一章“今古文家法”下,注明出于“陈伯弢先生”,这或许是因为当年他在北京大学学习时从陈氏治史学的原因,陈氏则是承袭清代朴学的一名年长学者。而清代经学的争论,集中在对《左传》的真伪与价值的判断上,范氏在该书第九章论《左传》时引“黄季刚先生”说,足以说明范氏治经恪守师说,信从古文的态度。

范文澜早年的《文心雕龙讲疏》一书,则在当年跟随黄侃学习《文心雕龙》的基础上继续钻研而撰成,自然带有章、黄学派笃守古文学派的余风。其后范氏投身革命,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哲学上自然推崇唯物论,从而与经学中的今文经学距离益远。自今文经学中衍生的讖纬等说,更会遭到彻底的否定。

杨明照与王元化的年辈有差别,与范氏的学术道路均有差异,但杨、王二人的主要学术活动均在建国之后。其时学习哲学,首先得分清唯心论与唯物论的界限。如上所言,清代朴学仍被认为具有一些唯物主义的元素,因而古文经学占有比较高的位置;今文经学,当然是必须严加批判,且予以抛弃的了。其中的讖纬等说,虽然内中杂有一些古代的神话传说,但总系汉代的官方学术,迷信色彩浓厚,故在强调阶级分析的情势下,也要彻底予以唾弃。

由此可知,范、杨、王等《文心雕龙》权威学者作出的这一结论,有学术传承方面的原因,也有时代风气的影响。考察一种学说,乃至追随首创者而起的一些学者对此所作出的阐释,往往也与各人的学术传承与时代风气有关。

徐雁平 这种分析法,在您前些年写的《文学“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说的重要历史意义》中也可见

到。在文中,您指出胡小石先生早年在两江师范学堂学农博专业,信从达尔文的进化论,又承其家学,接受扬州学派的影响,首先在中国文学史的讲授中引入“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学说,胡先生终身在高校任教,一直开设中国文学史课,他的学生之中也有不少人以讲授中国文学史为专业,如冯沅君、苏雪林、胡云翼、刘大杰等人,这一学说的影响也就随之扩大。这一写法,将若干片段串连,既有探案的趣味,又有学术史眼光。最重要的是,显现了传统学术评论方式的魅力。

周勋初 我平时也喜欢与学生聊学术掌故,其实掌故中的内涵很丰富。你看《师门问学录》,其中就有好多掌故,余历雄对掌故也很有兴趣。如余历雄让我谈谈詹锳与杨明照关于《文心雕龙》的论争时,我就是从两家受学的背景入手,结合两人的研究来评说两家分歧的原因及各自的短长。

回到刚才说的范文澜先生。我很喜欢读范文澜的书,他观点明确,说好说坏,绝不含糊,而且看法每与他人不同。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地位最高的老学者,实际上他在评价前人时,每持儒家观点,这只要看他评李白、杜甫、王维的批评即可明白。这也就是说,他骨子里传统的东西很多。这些东西从何而来,当然要追溯到他所受的教育。

徐雁平 从师承与学术背景着手研究问题,是否是您特别有心得的一种研究方法?

周勋初 我用这一方法确实探讨了不少问题,但这一方法不能用得死,就是不要将它作为判断的惟一依据,要用活,用得要有说服力。还要联系当时的文化与学术思潮。如以《〈文赋〉写作年代新探》一文为例,陆机何时作《文赋》,历来多有争论。我在读《文赋》时突然感到,“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等句,出于《老》、《庄》等著作;“若夫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等句,明显地受到当时玄学领域中言不尽意的影响。我又想到,唐长孺先生在分析《抱朴子》而推论南北学风异同的一篇文章中曾提到,吴国的学风比较保守,《易》主今文家说。陆机的从曾祖陆绩为江南的《易》学大师,世家大族以世传经学为门户的光荣,这就可以作出推断:陆机青年时期不可能接受玄学,只在到达洛阳之后,才有这种可能。杜甫说“陆机二十作《文赋》”,过去学界一直

沿用此说,现在看来,此说已难成立。

徐雁平 您的学生俞士玲在《陆机陆云年谱》中进一步落实了您的论断。您考《文赋》写作年代,行文似乎要求严整,密不透风,但您引用刘敬叔《异苑》中记载的陆机夜遇王弼之鬼的传说,说明陆机思想的变化。这样征引材料,作为例证解说,眼光很特别。您好像很能发掘特异现象背后的意义,如《刘勰的两个梦》,选题、解读也不同一般。两篇文章选题、用材料的不同,使得文章有些新奇,而且可读性很强。我觉得这两篇文章可能也是您的特色之作,很能表现您的一些重要治学方法。

周勋初 你说到的这两篇文章都发表在1982年,在那个时代的学术氛围中,这种特色可能更为明显。我总想在学术研究中闯出一条新路,这种用材料的方式,或者思考问题的方式,后来在我的唐代文学研究中表现得更充分,那就是对笔记小说材料的运用。在正史本传中,重要人物的事迹往往都写得四平八稳,较难看出人物的性格,韩愈在正史里的形象是正义凛然的,我写《韩愈的〈永贞行〉以及他同刘禹锡的交谊始末》,利用笔记小说中的材料,展现一个更为复杂丰富的历史人物形象:韩愈曾经恶意嘲弄至亲至敬的同年崔群,刘禹锡批评此举为“轻薄”,韩愈平时还有矫激、尖刻、好胜、重名的毛病。王运熙先生看了我的论文后,以为我的新见主要得益于研治唐宋笔记小说而发掘的材料。傅斯年先生有“官家的记载时而失之讳”、“私家的记载时而失之诬”的说法,认为官方记载和私家著述互有短长,必须对勘互读,不能偏于一端。研究唐代文学,如果只是依据两《唐书》纪传和文人别集,忽略了笔记史料,恐怕很难得出新的结论。

我觉得考证文章中增加一些小说笔记的材料,能使气氛生动。当然,这类材料的使用得有限制,看用在什么地方。假如把这用来考查某一件事的背景,说明其时的社会风气,就很有说服力,应该发掘这类材料的深层涵义。《刘勰的两个梦》写得比较充分,还不全在于对于两个梦的象征意义的把握,应留意文章后半部分如何展开,即要注意到当时许多文人都有梦到多彩之物的现象,盛行一时的占梦风气,以及说梦与玄风之间的关系。文章要看到后面,才能看到深处。

徐雁平 您撰写的《文心雕龙》论文虽然也以考证法辨明事实,但并不是以考据见长,所举例证似不丰富,但论说却很有力度。您特别注重在讨论问题时,要将问题放到当时的文化、学术思潮、政治背景中考察,这是使论文看起来很有力量的方法吗?

周勋初 我重视文献,但不太做纯粹的考证,在史料选择上也比较节制。资料无穷无尽,用得太多,文章难免拖泥带水,阻碍文章气势,伤害文章灵性。

我以为中国的文史之学研究,可以借鉴西方的多种方法与理论,但最根本的是要注意到我们是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问题,要贴着问题讲,顺着问题的脉络讲,要注意到问题的周边情况。我的《〈文心雕龙〉书名辨》是一篇不长的论文,我在文中指出,研究历史上的人物,需要将他放在生活的特定年代加以考察。他和同时代的人,因为生活背景一样,认识问题也就必然会有相同之处。当然一些杰出人物的成就往往会超出同辈人,但也不可能遗世独立。《文心雕龙》的书名,据《序志》篇开头一段文字,是说他在撰述时分别从构思与美文两方面着手。而这一想法,在魏晋南北朝时较为普遍,如萧统《文选序》中的“沉思”与“文心”意思相通,“翰藻”与“雕龙”涵义接近。如果看看前朝,也有不少类似的见解,如范晔在《后汉书》中说“情志既动,篇辞为贵。抽心呈貌,非雕非蔚。”“抽心”是说为文的用心,“呈貌”是指文章具有美感的外观。魏晋南北朝人探讨文学问题时,大多是从文思与美感两方面着手,刘勰为他的著作命名,正反映了时代的特点。“文心”与“雕龙”是主从关系,还是并列关系?还应从骈文写作特点考察,“文心雕龙”是对举成文,而不是现代人取书名时的思维方式。如何更好地理解书名涵意?范晔“抽心呈貌”一说的表述方式似乎可以考虑,这一说法不违刘勰的原意,同时顺着范晔的意思看,“文心”与“雕龙”的关联也更加紧密了。

徐雁平 联系前面提到的《刘勰是站在汉代经学“古文学派”立场上的信徒么?》,还有《〈文心雕龙·辨骚〉篇属性之再检讨》一文,这些文章都有在总结梳理、重新思考的基础上再探索的特征。您这些年写《文心雕龙》方面的文章,是否有一种要回到

历史语境中去讨论问题的思路?

周勋初 我在做研究时,也常是在探究研究中国学问的方式这个问题。中国人研究“中国学问”,不能完全套用西方的研究模式,也不能只是将“中国学问”作为“西方式研究”的一种取证。我研究唐代小说时,对以西方小说为标准甄别中国古代小说的做法很感困惑,总以为这么做没有注意到中国古代小说的特征。《文心雕龙》研究的西化痕迹也很重,这在词语、范畴、结构等方面十分明显,我并不排斥西方,我只是觉得中国问题有其特殊性。

因为年事已高,精力有限,这几年就缩短战线,主要研究几十年前就很有兴趣的《文心雕龙》。这些研究确实具有反思性质。以前我写过文章,提出刘勰兼崇玄学的问题,也是从刘勰并不固守古文学派立场着眼而进行考察的。现在我觉得这一问题还有深入探讨的必要,如何深入,就是要将这一问题放在中国经学发展史的背景下加以透视,考察刘勰生活年代经学界的情况,再对刘勰的行文脉络进行分析,才能正确把握其原意。

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篇中提出“马、郑诸儒”,只是举例性质,以马、郑为汉代经学的代表。因为郑玄遍注群经,尤精三《礼》,六朝的人都以他为经学的代表。马融为其师,成就亦卓著,师徒合称,也是学术界的常见做法。马融、郑玄在六朝人的眼中,形象是明晰的。郑玄注经,或可说是以古文为主,但他遍注群经,兼采纬候,不再专主古、今,后代经师大都就是沿着这条道路向前发展的。魏晋南北朝时经学界的情况大体上就是如此。马融自称“学无常师”,不时引用老庄思想以自我辩解。刘勰博学,对马、郑的为人学风当深有所知,那他又怎会把二人视作古文学派的代表人物来看待?当代学人根据“马、郑”一词立论,将刘勰视为儒家经学古文学派的忠实信徒,只是一种误读。

刘勰研治文学,将儒家学术视为最高准则,故对经学的影响很是关注。汉代帝王采取了哪些重大措施,决定经学动向,影响文学的发展,自然成了他的关注点。《文心雕龙》许多篇章涉及这一问题时,都把西汉、东汉两次经学会议置于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分析其对文学的巨大影响。他又撰《正纬》一篇,区别出其“有助文章”的一面,从而主张有选择

地从中汲取滋养。刘勰不但在《时序》篇中纵论两汉经学,还在其他许多篇章中叙及经学界的许多重要人物,对刘歆、扬雄、桓谭等人固有赞美之辞,然对董仲舒、公孙弘、刘向也表示推崇,这里看不出有什么固定的立场,只能视作南朝学术界的一般常见情况,后人从事《文心雕龙》的研究,也就不必太多地去关心他在经学方面的“立场”问题。

所以说,文章的深度与力量,不完全依靠穷尽所有的史料,有时是源自一种对时代氛围、文学风气、学术思潮的整体把握。

徐雁平 您的第一篇《文心雕龙》研究论文《刘勰的两个梦》发表于1982年,至今将近三十年。您好像一直以单篇论文发表您的学术见解,而且近几年论文比以前多,请问您是否对《文心雕龙》有一较有规模的著作?我去年曾听凤凰出版社姜小青社长说,他们社向您约了一本《文心雕龙》注释方面的著作,而从您近年发表论文的情况来看,似乎还有一个研究系列,将来是有两种《文心雕龙》研究著作出版吗?

周勋初 我做研究,往往从自己有心得的具体问题入手,写成单篇论文,而不是先去构想一个体系。我的《文心雕龙》研究是如此,李白研究也是如此。做研究工作,实际上体现一个人的智力。我非常重视单篇论文,一个人真正的才力体现在这上面。

其实,我研究《文心雕龙》比第一篇正式论文要早好多年,在60年代上课,就编有讲义。80年代初期,我开过两次《文心雕龙》的选修课,就将旧讲义重新检出,挑取《原道》等十三篇有代表意义的文章,编成一种取名为《文心雕龙解析》的教学用书。《文心雕龙解析》只解析了十三篇,我准备再作《诠赋》、《丽辞》两篇,因为精力有限,不想多做了,只想写本自己觉得有些心得的《文心雕龙》研究著作。我要在这本书的体例上创新,充分反映我读书与思考的过程。该书共十五篇,每篇大致包括三部分:第一是“解题”,对刘勰各篇命名的涵义与意图予以辨析解释。第二是正文的注释与解读,其中注释是逐段进行,解析字词;再在疏通字词的基础上讲各句、前后文之间的关联与转合;然后是思考,提出该篇中存在的重要问题,我是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希望对读者有所启发。第三是研究,收录我已发和未发的

专题研究论文,如在《辨骚》篇下收录我最近写的《〈文心雕龙·辨骚〉篇属性之再检讨》一文,《序志》篇下会收录我早年写的《刘勰的两个梦》,还有有关“折衷”说的几篇论文。这一体例与我教学的方式有很大关系,其中有一个思路:从培养自学能力到引导大家作初步研究,再提高到专题的深入研究,形成论文。

三、出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徐雁平 与中国文学批评史、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相比,您的李白研究起步较晚。也请您谈谈这方面的研究心得。

周勋初 我在较早写的《中国文学批评小史》中没有讲李白。1989年中国李白学会的年会在安徽九华山举行,郁贤皓教授邀我参加,我就写了第一篇李白研究论文《李白家人及其名字寓意之推断》。后来出版了《诗仙李白之谜》,2003年应陈平原教授之约,编辑出版了《20世纪中国学术文存》中的《李白研究》,2005年出版了《李白评传》,收在《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展示了我李白研究中的多方开拓。李白研究,是唐代文学研究中的高难度题目,主要是因为研究积累太丰富。如果要谈心得,那就不能从概念出发,或者从前人的研究模式出发。

徐雁平 您说的研究模式,是指阶级分析模式吗?从概念出发又如何理解?

周勋初 先说从概念出发吧。胡小石先生有一篇《李杜诗之比较》的文章,是他1924年的演讲,至今仍有启发性。他说李白守着诗的范围,杜甫则打破诗的藩篱,这与通常的说法不一样。人们的印象中,杜甫信奉儒家思想,在文学思想方面倾向于保守,而李白是信奉道家思想的浪漫主义诗人,在文学思想方面是进步的。这一“常识”不准确。李白自称是西凉武昭王李暠之后,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凉地处偏远的西陲,相对于战乱的中原而言,还算是一个比较安定的地区,也保留了许多汉魏六朝的文化,李白受这样的文化传统影响,擅长的是古诗、乐府。所以不能在概念分析里转圈,必须回到作品中来,回到他所处的时空中来。

我们的研究,受非学术性因素影响太大,如郭

沫若的著作,造成跟风研究的坏风气。我总有些不合时宜,喜欢翻旧杂志,这是“落后于时代”的表现。我很重视陈寅恪《李太白氏族之疑问》一文,这篇论文从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角度入手,认为李白是胡人,我不信这种结论,但对我很有启发。这种文章比起郭沫若那种依傍政治而抢占制高点的著作来,无法相提并论。

徐雁平 阶级分析的研究方法主导古代文学研究的局面,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得到转变,一系列的文学家年谱和以考据见长的著作出版可视为标志。您在1980年出版了《高适年谱》,为何没有以同样的研究方法做李白研究?

周勋初 在唐代文学研究中,考证确实作用重大。譬如傅璇琮先生的《唐代诗人丛考》,有转变一时学术风气的作用,对于中小诗人的研究、对于文学流派的研究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但考证又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文学有文学的特征,它不是史学,更不是自然科学。具体落实到唐代诗人的考证上来,我做《高适年谱》,对高适天宝八载登有道科之前的行踪,没有十分的把握,只提供一或可被大家接受的解释,因为史料不足。考证在面对较为特殊的对象时,有不少局限性。如研究李白,要对其生平考证得十分精确,就很困难,因为他结交的人中大都为中下层的无名人物,漂流各地,文献记载很杂乱,自己的诗文中也少明确的时地记录,考证起来,就有难度。这就得考虑开辟新的研究路径。这条路径就是从文化的角度研究李白。

徐雁平 您从文化背景角度研究李白,首先作李白及其家人名字寓意一文,引人瞩目,还有“剔骨葬”那篇,应该也很受人关注。请您简要谈谈相关研究。

周勋初 李白这个人物很奇特,身上有许多谜一样的东西。我是试着慢慢解开这些谜的。如李白及其家人的名字就很值得留意,他们好像对西部有特别的感情。这篇文章的角度有些奇特,但反响不错,我便构思有关李白研究的其他文章,陆续写了十篇,后来结集在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名为《诗仙李白之谜》。

徐雁平 您说到这里,我想起闻一多先生在他的著作中讲过中国西部对于古人有特别的意义,似

乎是神话的渊藪。后来看姜亮夫先生的《楚辞》论著,其中说到屈原作品中关于西部的语句也很多,说是对祖先诞生之地的怀念。看来西部非同寻常。

周勋初 你这点联系很好。我们今天对故土或祖先诞生之地,感情已渐渐淡漠,所以很难理解古人的感情。文化传统和信仰对古人而言,是溶在血液与精神中,他们在很多代后,与故土、传统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李白身上的异族文化痕迹,还可通过丧葬习俗来考察。李白五岁入蜀,二十多岁出蜀,受南蛮文化的影响。“剔骨葬法”,自《墨子》的《节葬》篇便有记载,但在汉族生活的中原地区是从未听闻的,李白就是用这种葬法来处理好友吴指南的丧事,这就使我想到了蛮族文化对李白的影响。《新唐书·吴保安传》记载郭仲翔“二次捡骨”归葬吴保安之事,可与李白葬友一事互相参照。

徐雁平 您的这些推论与研究很有趣味,初看觉得有些惊险新奇,但将它们与其他信息联系起来看,又觉得言之有理,能站得住脚。您写这些文章时有什么感觉?

周勋初 你有新奇惊险的感觉,可能是因为文中的见解与角度不同一般造成的。我的《魏氏“三世立贱”的分析》一文,不少人读后也有同感。曹氏三代都把出身贫贱的女子立为后妃,《三国志》裴注中就提到过,但一般认为这一现象是曹氏家族的非礼妄为,却不挖掘其中的深层涵义。曹氏这么做,不但有阻止后族干政的目的,还意味着对传统道德观念的离弃。曹氏这样的家风,对“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建安文学影响深刻。

徐雁平 您这类文章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对一些被人忽略的细节或小问题深入挖掘,从而显现出重要意义。因小见大,中间是否有一个跳跃性思维?

周勋初 有趣味、有重要意义的细节,其实并不好找,或者说不易遇到。如何发现,要有准备,也要机缘。细节和具体问题如何去解读?一定不能就事论事,不能将它们看做孤立的现象,要将它们与周边或前后的事情放在一起,这些现象会彼此解释。还是回到前面说到的李白研究。你单看李白与家人的名字,觉得奇怪;单看他“剔骨葬友”,也有同

感,但如果将这两个现象联在一起,就稍感自然了。对这一问题不断探讨,多方考察,你就会感到文章惊险的后面有着强有力的支撑。

先看李白的婚姻,他的两次婚姻都是入赘,与众不同。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自称:“许相公家见招,妻以孙女”,并不以为耻。这是因为西域各民族还保存着不少母系社会留下的风俗,妇女在家中地位较重要。

再看他的个性爱好,李白好浪游任侠,喜饮葡萄酒,热爱音乐歌舞,这也与边陲文化有关。

还可观察他受教育的情况。唐人的启蒙教育是读《千字文》与《太公家教》等书,也学习儒家经典,写近体诗,然后参加科举考试,进入仕途。李白的情况很不一样,他“五岁学六甲,十岁观百家”,这是汉魏学制,而西凉承袭的是汉魏六朝传统,所以李白在文学上喜欢的是古诗、乐府、辞赋,不喜近体,唐初颁行《五经正义》,文人参加科举考试一定先在正经正史方面下功夫,而李白学的是百家杂学。他不参加科举考试,只想要一朝出奇策,立不世之大功,“立抵卿相”,有些纵横家的味道。天宝十五载,李白入永王李璘幕,陷于逆境,这与其文化背景不无关系。

我一一解开诗仙李白之谜时,除强调文化交流外,还要证明他在创作上的成功与政治上的失败,与他的家庭、所处地域有关,这些都可在他独特的文化背景当中找到解释。

四、“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徐雁平 我曾听徐兴无老师说,他跟从您读博士时,师生交流似乎以面谈为主,而类似现在的教室上课不多,似乎不用上那么多课程,但学术研究照样做得不错,这是什么原因?

周勋初 这种上课方式,如《师门问学录》中所展现的那样,是比较传统的教学方式。旧时书院讲学,往往有弟子问、老师答的“问答”记录,你研究清代书院,应也看到不少这类文献。这种学习,有从游之乐,有观摩濡染之效,还有感情交流,不只是知识的传授。但在现在的教学体制中不易推广,除不能一对一地教学外,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多的是专家

型导师,而没有通人型导师。我不是通人,达不到这种境界,而且真正的通人也不多了,但我从先秦到晚清的学术与文学都能讲讲,所以还能回答学生的各种问题。与学生面谈或闲聊,实际上类似中医里面的把脉一样,从中发现学生的才性,他的所长和所短,然后有针对性地调养培育。

徐雁平 面谈似乎是无法取代的学习交流方式,内容当然较多,博士论文选题以及如何展开研究应是其中的主要内容吧?

周勋初 这是谈话的一个重要内容。作为博士阶段的研究,选题必须得当,要能够发挥自己的优势,要能够完成本阶段的学习目标,还要有长远的研究计划,才能在博士毕业后继续相关的研究。如果完成博士论文以后,在学术上停滞不前,这样的训练是有问题的。

学生的选题也是在一次一次的交谈中磨出来的。你看《师门问学录》中余历雄的选题,最初是想做“北宋三苏政论文研究”,最后定为“两《唐书》文史观的比较研究”,其中反复讨论,都有记录。又如胡志志,他的博士论文选题“金代文学研究”,也是在面谈中得知他读了哪些书,兴趣何在,然后形成具体研究计划。他的论文做得不错,现在是金代文学研究专家,但我还在提醒他,要强化金代文学与宋代文学关系的研究。

徐雁平 您的文集第一册正文前有不少著作书影,还有胡小石、洪诚、孙望、程千帆四位先生关于您的论著批语的照片,这应是表示在学术研究中良师益友的重要性。有意思的是,余历雄在马来版《师门问学录》正文前有您批改他博士论文的照片。这好像是在显示一种教学传统?

周勋初 这也就是手把手地教。改文章,对学生来说很重要,他们会从中琢磨老师为何修改,从而提高自己的。我用在改学生论文上的精力和时间很多,你看俞士玲《西晋文学论稿》后记中提到她从日本留学一年回来后,要按期毕业,如何紧张地写论文。她前晚送来写好的章节,我常是在次日就给她写出修改建议。学生毕业后,他们寄来的论文我也修改,我已经不指导博士生了,但有人将论文送给我,我也尽力提出建议。童岭将他的博士论文《日藏六朝隋唐汉籍旧钞本综合研究》初稿给我看,我就

提供了有关1981年扬州地区出土“广陵王玺”的重要信息,可破日本学术界主张“汉委奴国王印”伪造说之谬。任教于台湾辅仁大学的学生陈恬仪将博士论文《谢灵运仕隐曲折研究》寄给我,我也提出意见,这论文写得很好,但我希望她修改后能更完善。

徐雁平 2008年4月莫砺锋老师在您八十生日祝寿会上致辞,曾说:“周先生对教学工作付出的心血,丝毫不逊于他本人的学术研究”,您如何看待自己的教学工作?

周勋初 我除出版七卷本文集外,又编纂、主编了几种大书,或许有人有误解,觉得我只埋头学术,只管自己写文章,不管学生。其实,就像莫老师所说,教学生用的时间比科研时间还多。教师的责任首先是教书,教好书才算是尽到了责任,这是一种职业道德。现在《师门问学录》提供了一个了解我如何教学生的窗口。

我对学生好,与我对师生关系的感悟有关。我的老师对我好,我才能走上治学之道。在我毕业的时候,胡小石先生、罗根泽先生都希望我留下来。方光焘先生任系主任,他为了让我跟胡先生学,还与人事秘书发生正面冲突。他也希望我留下来。我这个人没有什么特殊才能,成绩也一般,也就是六七十分。我有什么地方值得老师们如此器重?自己也觉得很奇怪。胡先生、罗先生、方先生在大学里教了几十年书,见过的学生不知道有多少,竟然认为我可以造就;又因为我不能留在南大,胡先生就很生气。但当时学校或许认为我政治上不合格,不让我留校。

教书是在传承文化,同时也是传承一种感情。我在祝寿会上的演讲,主要就是强调老师要关怀学生,继承“有教无类”的优秀传统。

五、教学相长 探求不歇

徐雁平 您最近写的一些《文心雕龙》和李白的文章中,似乎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动向,好与其他学者商榷。这在过去好像不太多见。

周勋初 是这样。这对我来说,可以说是心存隐忧、有感而发。因为眼下《文心雕龙》的研究者中普遍存在着一种低沉的情绪,以为这门学问在上世

纪90年代兴起过一阵高潮之后,随即步入了低潮。一些年轻学者认为,老辈学者的成就已经高不可攀,无法超越,《文心雕龙》的文章已经被人写光了,大家已难有什么作为。《文心雕龙学刊》上的文章,大都题目很小,确实少有开拓。在一次会议上,甚至还有人称自己这一代为“残废”,这样的贬损,实在令人心寒。我因而感到应该尽我所知,和大家一起寻找一条走出困境的道路。

我和罗宗强先生讨论过这个问题,认为应在中国学术史的基础上研究《文心雕龙》。刘勰博学,书中融合了前此的经史百家,又受后起的玄学与佛学的影响,内涵极为丰富,思辨极为细密,论断极为深刻。而近代的一些研究者,接受的已是分科后的教育,他们往往各有专精,而又常是出现一些不应有的错误。这也就是说,老一辈人常是各有所短。去年我在《古典文献研究》第13辑上发表了一篇《西河王济非王武子辨》,批评周振甫等几位先生的错误。大家都认为周先生的作风很踏实,他的《文心雕龙注释》被列为“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定书目·大学生必读”,可见此书受重视的程度。虽然我所批评的是书中的个别错误,但还是反映了史学方面修养的不足,这种问题在以前的朴学家身上是不大会出现的。有的学者则在哲学等方面有弱点,有的则不太了解近代学术思潮,而这对于从事学术活动的人来说,也应具备。一代代的学者总是受到某一时段主流思潮的影响,产生很多局限。只要我们的学问从根本做起,培植起深厚的学力,把刘勰的《文心雕龙》放到当时的语境下作整体考察,克服前人的偏颇之见,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突破,那么每一种学问都有很多新的空间可以开拓,人们对学问的探求将是无穷无尽的。

我写《刘勰是站在汉代经学“古文学派”立场上的信徒么?》一文,与范文澜、杨明照、王元化等人商榷;写《〈文心雕龙·辨骚〉篇属性之再检讨》一文,与牟世金等人商榷;写《“折衷”=儒家谱系≠大乘空宗中道观》,与张少康等人商榷……其实上述诸位都是我的前辈和好友,我写这类文章,向他们讨教,目的也在求得“龙学”的发展。我对经学、佛学与目录学所知甚浅,如今正像孟子所说的:“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目的只在求得“龙学”的前进。

徐雁平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刊》2007年号上,您又发表了长篇论文《李白的晋代情结》,您好像一直对李白研究有很浓厚的兴趣?

周勋初 我对李白的研究,植根于对唐代文化的探索。在中国历史上,唐代有着异样的光彩。我在最近写的《宋人轶事汇编》前言中,将唐代文化与宋代文化作比较,也是想从两个朝代的不同面貌上来观察唐代文化的特点,对此进行新的探讨。李白研究也得放在这种唐代文化背景下探讨。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称“五胡乱华”,大批游牧民族入居中原后,逐渐与久居此地的汉族融合,到了唐代才真正融为一体。长期阻隔而形成的南北不同民风,到了唐代才慢慢凝聚成一种高亢而有华彩的风貌。况且唐朝实行开放政策,西域文明通过丝绸之路而输入,东方日本和南方的许多小国,也都纷纷前来学习与交流,因此唐代文化呈现出特异的多姿多彩。我认为,李白最能充分呈现这一唐代文化的特点。因此,我把李白定位为“多元文化的结晶”。

我在以前写的文章中,论证了李白受到南蛮文化和突厥文化的影响,2006年我在《中华文史论丛》第1期上又发表了《李白与羌族文化》一文,说明他与羌族的关系。我的关注之点,放在四川西北部,这里正是少数民族丛居的地区,也是南朝与西凉等地沟通的要道。这种研究工作,要求很高,要从国家、民族、宗教、民俗、神话、传说、历史、地理等方面综合起来,作细致的爬梳和剖析,才能得出新的结论,这可不是介绍李白的几首诗、几篇散文就能奏功的。我对这种探讨很有兴趣,只是限于精力日退,恐怕往后的进展不得不放缓了。

徐雁平 我已经看到马来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的新版《师门问学录》,发现内容与凤凰出版社原版已有很大不同。您似乎对这本书很看重,请您谈谈其中原因。

周勋初 我这种人,过去称为教书先生,一辈子就做一件事:教书。因为教的是大学生,总想讲出

些新意,因此杂七杂八地写过一些东西,但都没有留下什么有关我的主要活动的文字,如今却由最后受业的弟子余历雄留下些记录,当然会感到高兴。凤凰出版社的本子传到马来西亚后,余历雄任教的拉曼大学也很重视,大家对他的好学多有好评,这对提升他在学术界的影响也有帮助。马来西亚的华人很重视中国的传统文化,于是就有出版社来与凤凰出版社商量,要在凤凰出版社出新版之前,先在马来西亚出版,这当然应该支持。于是去年年底,就出了此书的马来西亚版。

我和余历雄商量,既然大陆已有很多学校把这书列为培养研究生的重要参考书,那何不把一些书评也一起印进去,这也可帮助读者进一步了解这书的作用。这书问世后,书评很多,评论者分从各种不同方面加以探讨,对于读者或许有所启发。网站上的评论也很多。我们最后决定,从中挑选九篇正式发表的书评附在书后。我又考虑到,一些单位曾经来采访过我,探讨治学方面的问题,性质与《师门问学录》相近,也可一起印进去,供读者参考。

我的研究工作,都是围绕着教学而进行的。一些研究著作,可以说是副产品,只有这本《师门问学录》,才应该说是主要产品,对此我当然会很重视。2008年,三十七位受业弟子各撰学术论文一篇,由莫砺锋编成《周勋初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他还撰写了序言与一篇研究述评《贯通历代,弥纶群言》。书中同样洋溢着师生情谊,这也是作为教师的我的最大快慰。

徐雁平 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访问地点:周勋初先生家中;访问时间:2011年1月8日,1月12日,1月23日。此外,又利用了本人2010年6月8日部分访谈内容。童岭博士提供了部分访谈记录,特此致谢。

责任编辑 山木